

青少年双向社会化模式与亲子关系研究

刘长城 官秀丽 魏晓娟

摘要:在急速的社会变迁面前,亲子两代由于对新事物的理解吸收能力以及对新社会的适应能力不同,使年长一代在失去教化的绝对权力的同时,年轻一代却“反客为主”获得了新的文化权威。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传统的受教育者反过来对施教者施加影响的现象,即“反向社会化”。“反向社会化”的产生并向更深层次发展,表明传统社会单向的文化遗产模式正在向现代社会双向互动传承模式转变。可以说正向社会化与反向社会化是双向互喻,并行不悖的,由此形成青少年的双向社会化模式。这种双向的社会化影响力对家庭亲子关系和亲子之间的互动方式产生强烈冲击,并对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与健康成长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青少年 网络时代 双向社会化 反向社会化 文化反哺 亲子关系

一、文化反哺与反向社会化

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文化遗产在方向上总是从上而下的,年长一代以教化者的身份将知识经验、谋生技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传递给下一代,而年轻一代总是扮演着被教化的角色。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这种急速的社会变迁面前,亲子两代由于对新事物的理解吸收能力和对新社会的适应能力不同,使年长一代在失去教化的绝对权力的同时,年轻一代却“反客为主”获得了新的文化权威。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传统的受教育者反过来对施教者施加影响的现象,这种“反向社会化”现象的出现,说明在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不仅文化遗产的内容有了极大的变化,而且亘古不变的文化遗产方向和形式也有了变化。

1968年,贝尔在《再释社会化研究中的影响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儿童与家长关系的“双向模式”,这被公认为是研究反向社会化问题的肇始之作。1970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后喻文化”理论。她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由古至今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玛格丽特·米德,1987)。米德敏锐地洞察到,由于“二战”以来人类社会的急剧变迁,成年人原有的知识经验甚至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权威的解釋力和传承价值,而现代青年却对新事物具有较高的吸收、接受能力,能够了解、经历和吸收他们眼前发生的这些迅猛的变化,更容易适应社会的变迁。同年,社会学家查尔斯·赖克在其著作《美国的返青》中提出“第三意识”理论,确信年轻一代已经形成了一种和他们的祖辈(第一意识)与父辈(第二意识)完全不同的“第三意识”,并充分肯定了年轻一代在新时代中的历史作用。赖克宣称年长的一代应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若干年的重新学习、重新接受再教育”(Reich,1970)。

与我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文化变迁相契合,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反向社会化”与“文化反哺”的研究。

1988年,周晓虹发表了《试论当代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堪称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奠基之作。他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对年轻一代将文化知识等传授给年长一代的现象,用“文化反哺”概念进行阐释,在理论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对“文化反哺”的解释是:“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轻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周晓虹,1988)。1991年李秋洪在《反向社会化——青年社会化研究的新课题》一文中对青少年反向社会化的性质、理论背景、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了

探索。1998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孙云晓等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向孩子学习》一书,揭示了中国社会在20世纪后期发生“文化反哺”现象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反哺的现实意义。2000年,周晓虹通过把“文化反哺”这一新型的文化遗产模式置于家庭内部的亲代和子代之间,利用典型小组访问法进行实证研究,形成了《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等研究成果。2001年,杨立、郗健以南京市全体大学生为调查总体,就未来传播时代青少年“文化反哺”现象的诸多内容,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其他如张雁华的《“文化反哺”启迪下的新型师生关系》、罗正强的《文化反哺与话语权利》、白显良的《青年社会化中的“文化反哺”现象探析》等研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青少年双向社会化模式的界定

“文化反哺”的产生并向更深层次发展,表明传统社会单向的文化遗产模式正在向现代社会双向互动传承模式转变。社会学对青少年社会化的早期研究多侧重于正向社会化,如教育社会学的奠基人涂尔干正是从正向社会化的角度首先提出了社会化的概念。从整体来看,传统的社会化理论把社会化理解为一个单向的文化传播过程,是由社会机构、大众传播媒介、各种组织、家长、教师、权威向青少年个体传授文化价值观、行为规范、生活技能的过程。

如果说对社会化概念的传统理解是以单向性为特征的话,那么,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变迁的事实有力地改变了人们对社会化概念的理解,如西方人本主义、符号互动理论、代沟理论等意识到,社会化是一个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不仅年长一代能对年轻一代施加影响,年轻一代同样也能反过来使年长一代在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上发生变化,也就是反向社会化。

进入网络时代,人类的文化传播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青少年获得文化知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途径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家庭中,青少年虽仍然接受父母的指导,但同时许多方面能够对父母进行文化反哺,特别是在数字技术、流行文化、时尚休闲等方面,具有明显的“话语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文化反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向社会化”的过程,即传统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反过来施加影响,向他们传授社会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化过程。如果说正向的社会化是上一代人用既存的文化价值观、行为规范、生活知识与劳动技能去哺育下一代,使青少年成为长辈所希望的、适应社会环境的、能担负特定社会角色的合格成员,那么反向社会化则是一种文化反哺,是下一代人努力用自己创造的文化成果去改变环境、重塑上一代(李秋洪,1991)。可以说正向社会化与反向社会化是双向互喻,并行不悖的,由此形成青少年的双向社会化模式。这种双向的社会化影响力对家庭亲子关系和亲子之间的互动方式产生强烈冲击,并对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与健康成长产生深远影响。

三、双向社会化与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指父母与子女间的相互关系。亲子冲突、亲子亲和是衡量亲子关系的两个重要维度。参照以往研究(王美萍、张文新,2007),本研究将亲子冲突界定为青少年与父母之间公开的行为对抗或对立。它常表现为争吵、分歧、争论、甚至身体冲突等,并从亲子冲突的次数与强度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考察。亲子亲和主要指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结,它既可以表现于积极的互动行为中,又可以表现在父母与子女心理上对彼此的亲密感受。

青少年期是个体生理与心理变化均为显著的时期。青少年自主意识的增强及其对父母权威的质疑,导致原有的亲子关系格局被打破,进入从父母居支配地位的单向权威向亲子双方居于相对平等的地位的双向权威转变的时期(Fuligni,1999:1030-1044)。亲子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主要表现为亲子冲突的增加与亲合度的降低(Holmbeck,1996;Steinberg,1981)。

与青少年期亲子关系的转变相一致,家庭内青少年社会化的模式开始发生转变,出现了子代对亲代的反向社会化。社会化的格局被打破,进入从父母对青少年的单向社会化到亲子双方双向互

喻转变的时期。既然同在青少年期发生相似的转变,亲子关系与社会化模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当然,反向社会化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但其出现于青少年期这一事实却说明其与亲子关系的转变一样,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

四、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以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山东省德州市和济南市的6所中学选取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各3个班进行调查,有效被试722人。被试的年级、性别分布如表1。

表1 青少年的性别、年级分布

性别	年 级					总计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男	84	67	85	75	45	356
女	78	66	60	70	92	366
总计	162	133	145	145	137	722

被试中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占19.7%,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占17.6%,为办事员的占9.7%,为体力劳动者的占18.3%,为商业工作人员的占6.8%,为个体经营者的占25.9%;母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的被试占19.4%,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占8.2%,为办事员的占9.1%,为体力劳动者的占18.8%,为商业工作人员的占9.3%,为个体经营者的占28.7%;父亲受教育水平为小学的占4.2%,为初中的占22.2%,为高中、中专或技校的占39.2%,为大学的占28.3%,为研究生的占6.2%;母亲受教育水平为小学的占9.3%,为初中的占20.3%,为高中、中专或技校的占39.5%,为大学的占20.4%,为研究生的占2.9%。

(二)研究工具

1. 亲子冲突与亲子亲和问题卷

本研究所用亲子亲和和亲子冲突问卷由专业人员根据我国文化实际进行过仔细修订,并已在相关研究中使用(Fuligni,2004:180-192;王美萍、张文新,2007)。

亲子冲突问卷:首先让被试回答近半年来是否与其父亲/母亲谈论过问卷中所列的16个问题,若谈论过,则进而依据5点量表(1—很平静,5—很气愤)回答谈论时其(指被试)心情如何。统计分析时对回答心情为“2”以上的项目求平均分得出冲突强度,然后对回答心情为“2”以上的项目重新编码并累加求和作为亲子冲突频率的指标。分数越高,表明冲突越多。该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alpha=0.80$)。亲子亲和问卷:共10个项目,采用5点记分(1—几乎从不,5—几乎总是),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8。

2. 文化反哺和父母影响问卷

此问卷在参阅大量有关文化反哺的研究资料以及对青少年和家长进行访谈的基础上编制而成,包括5个分量表共21个题目。5个分量表分别为消费休闲反哺分量表、技术反哺分量表、父母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父母对青少年观念的影响和青少年对待文化反哺的态度。问卷采用5点记分,(1—从不,5—总是)由青少年作答。5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9、0.84、0.70、0.72和0.57。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2。

(三)施测方法与程序

以自然班为单位进行施测,每班由一名主试负责。被试一般在20分钟左右完成问卷,然后由主试统一回收问卷。

最后,采用 Foxbase4.0 和 SPSS13.0 进行数据的管理与统计分析。

五、结果

(一)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考查

采用主成分分析,最大方差旋转法,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抽取出6个因子,问卷中的第20、22题在6个因子上的负荷值均小于0.30,第21、24题在6个因子中的某两个因子上负荷值区分度不高,故将其剔除后对剩余21个题目再次进行因素分析,KMO和Bartlett检验表明采样充足度高达0.855,显著度小于0.001。5个因子分别是:消费休闲反哺、技术反哺、父母对青少年的行为影响、父母对青少年的观念影响、青少年对文化反哺的态度。父母对青少年的行为影响和父母对青少年的观念影响在下文中简称“父母影响(行为)”和“父母影响(观念)”。21个题目在5个因子上的因素负荷和因子解释率见表2。

表2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因素负荷与解释率)

项目	消费休闲反哺	技术反哺	父母影响(行为)	父母影响(观念)	青少年的反哺态度
T1	0.613				
T6	0.496				
T11	0.588				
T12	0.675				
T14	0.689				
T17	0.720				
T18	0.721				
T2		0.655			
T3		0.913			
T4		0.910			
T7			0.477		
T9			0.821		
T10			0.786		
T23			0.610		
T8				0.551	
T15				0.773	
T16				0.780	
T25				0.672	
T5					0.756
T13					0.448
T19					0.784
解释率(%)	22.566	14.248	7.954	5.806	5.445
累积解释率(%)	56.019				

消费休闲反哺分量表、父母影响(行为)、技术反哺分量表、父母影响(观念)和青少年的反哺态度5个分量表的Cronbach系数分别为0.79、0.74、0.84、0.72和0.57,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2。5个因子的相关在0.114-0.515之间,显著性水平为0.01;5个因子与问卷总均分的相关在0.546-0.719之间,显著性水平为0.01。各因子与条目的相关情况如下:消费休闲反哺分量表各条目间的相关为0.252-0.531,各条目与分量表之间的相关为0.577-0.725;父母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分量表各条目间的相关为0.208-0.604,各条目与分量表之间的相关为0.621-0.792;技术反哺分量表各条目间的相关为0.518-0.858,各条目与分量表之间的相关为0.765-0.858;父母对青少年观念的影响分量表各条目间的相关为0.341-0.506,各条目与分量表之间的相关为0.453-0.832;青少年对待文化反哺的态度分量表各条目间的相关为0.276-0.360,各条目与分量表之间的相关为0.680-0.791。以上相关显著性水平均为0.0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文化反哺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二)对双向社会化模式特点的分析

1. 双向社会化模式的基本特点

(1) 反向社会化的基本数据:对青少年消费休闲反哺分量表和技术反哺分量表均分的统计显示:0.8%的青少年几乎不对父母进行消费休闲方面的反哺(得分等于1),67.3%的青少年“偶尔”对父母进行消费休闲方面的反哺(得分大于1小于3),27.3%的青少年“有时”对父母进行消费休闲方面的反哺(得分大于等于3小于4),只有4.6%的青少年经常对父母进行消费休闲方面的反哺(得分大于等于4)。2.9%的青少年几乎不对父母进行技术方面的反哺(得分等于1),37.4%的青少年“偶尔”对父母进行技术方面的反哺(得分大于1小于3),33%的青少年“有时”对父母进行技术方面的反哺(得分大于等于3小于4),26.7%的青少年经常对父母进技术反哺(得分大于等于4)。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青少年的消费休闲反哺与技术反哺存在极其显著差异 $[F(1,721) = 166.752, P < .001]$,青少年的技术反哺程度极其显著地高于消费休闲反哺($M_{\text{技术}} = 3.08, M_{\text{消费}} = 2.60$)。

(2) 正向社会化的基本数据:对青少年接受父母影响的统计显示:在行为表现方面,25.8% (186人)的青少年“偶尔”接受父母的影响(得分小于3),57.8% (417人)的青少年“有时”接受父母的影响(得分大于等于3小于4),16.5% (119人)的青少年经常听从父母的指导(得分大于等于4)。在观念方面,24%的青少年“偶尔”接受父母的影响(得分小于3),49%的青少年“有时”接受父母的影响(得分大于等于3小于4),27%的青少年经常听从父母的指导(得分大于等于4)。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显示:父母影响(观念)与父母影响(行为)存在极其显著差异 $[F(1,721) = 77.993, P < .001]$,青少年接受父母观念影响的程度极其显著地高于接受父母行为影响的程度($M_{\text{观念}} = 3.35, M_{\text{行为}} = 3.09$)。

将消费休闲反哺分量表得分和技术反哺分量表得分相加求其平均得到青少年反哺总均分,将父母影响(观念)得分和父母影响(行为)得分相加求其平均得到父母影响总均分,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显示:父母影响存在的水平显著高于青少年对父母的文化反哺水平 $[M_{\text{父母影响}} = 3.22, M_{\text{文化反哺}} = 2.84, F(1,721) = 121.827, P < .001]$ 。将青少年反哺总均分与父母影响总均分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内青少年的文化反哺与父母影响呈低度正相关($r = 0.154, P < .01$)。

2. 双向社会化的年级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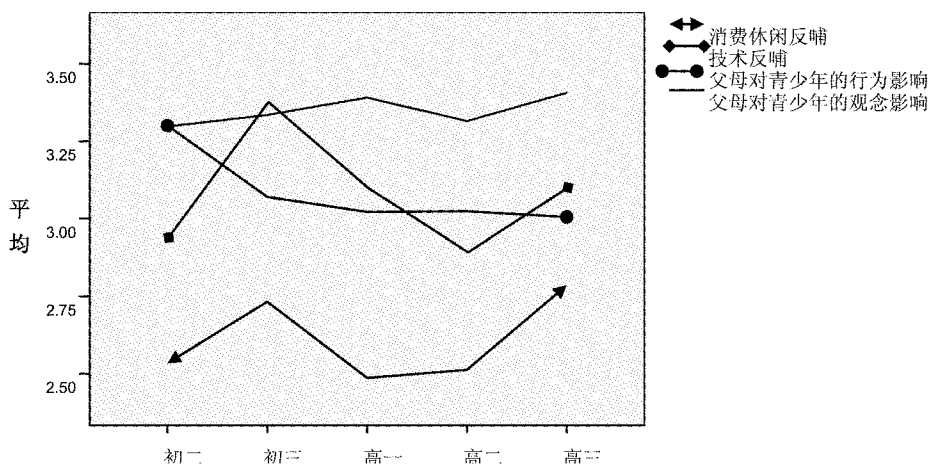


图1 青少年双向社会化的年级趋势

以年级为自变量,分别以消费休闲反哺、技术反哺、父母影响(行为)、父母影响(观念)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的消费休闲反哺、技术反哺和父母影响(行为)均存在极其显著的年级主效应 $[F(4,721) = 5.222, F(4,721) = 4.910, F(4,721) = 3.881, P < .01]$,父母影响(观念)不存在年级主效应 $[F(4,721) = 0.566, P > .05]$ 。进一步的LSD比较显示:消费休闲反哺方面,初三和高三反哺程度显著高于初二、高二和高一,其他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技术反哺方

面,初三青少年的反哺程度显著高于其他4个年级,其他4个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初二青少年接受父母影响(行为)的程度显著高于其他4个年级,其他4个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

3. 双向社会化的性别差异

以消费休闲反哺、技术反哺、父母影响(行为)、父母影响(观念)为因变量,性别为自变量,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青少年的消费休闲反哺存在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t = -5.563, P < .001$),女生的反哺程度极其显著地高于男生($M_{男} = 2.46, M_{女} = 2.75$);父母影响(观念)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 = 2.283, P < .05$),男生接受父母观念影响的程度显著高于女生($M_{男} = 3.41, M_{女} = 3.28$)。其他变量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4. 双向社会化的父母职业和文化程度差异

以母亲职业和受教育水平为自变量,消费休闲反哺和技术反哺分量表为因变量,分别进行 6×5 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母亲的文化程度不同,其子代在消费休闲反哺和技术反哺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F(4, 692) = 9.364, F(4, 692) = 3.975, P < .01$]。

消费休闲反哺:文化反哺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母亲受教育程度是研究生的青少年,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学的青少年,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或技校的青少年,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青少年,母亲受教育程度是小学的青少年,除母亲受教育程度是大学的青少年和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和技校的青少年反哺量表得分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外,其他两两之间差异显著。不存在母亲职业主效应[$F(6, 692) = 0.746, P > .05$]和母亲职业与母亲受教育程度之间的交互作用[$F(19, 692) = 1.022, P > .05$]。

现代技术反哺:文化反哺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母亲受教育程度是研究生的青少年,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学的青少年,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或技校的青少年,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青少年,母亲受教育程度是小学的青少年,除母亲受教育程度是大学的青少年、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和技校的青少年和母亲受教育程度是研究生的青少年反哺量表得分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外,其他两两之间差异显著。不存在母亲职业主效应[$F(6, 692) = 0.520, P > .05$]和母亲职业与母亲受教育程度之间的交互作用[$F(19, 692) = 0.684, P > .05$]。

分别以消费休闲反哺和技术反哺分量表为因变量,父亲职业和受教育水平为自变量,进行 6×5 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青少年文化反哺的上述两个方面均不存在父亲的受教育程度[$F(4, 692) = 1.220, F(4, 692) = 1.624, P > .05$]和职业主效应[$F(6, 692) = 1.920, F(6, 692) = 1.398, P > .05$],也不存在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F(19, 692) = 0.800, F(19, 692) = 1.024, P > .05$]。

表3 父亲为不同职业的青少年在父母影响(行为)和父母影响(观念)分量表的平均分和标准差

父亲职业	父母影响(行为)		父母影响(观念)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专业技术人员	3.23	0.79	3.51	0.73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2.96	0.72	3.38	0.73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3.09	0.79	3.31	0.74
体力劳动者	3.15	0.78	3.29	0.78
商业工作人员	3.05	0.83	3.43	0.78
个体经营者	3.05	0.81	3.25	0.76
总计	3.09	0.79	3.35	0.77

分别以父亲和母亲的职业、受教育程度为自变量,父母影响(行为)和父母影响(观念)分量表为因变量,进行 6×5 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对青少年的行为影响方面不存在父亲和母亲的职业[$F(6, 692) = 0.853, F(6, 692) = 0.867, P > .05$]、受教育程度[$F(4, 692) = 0.247, F(4, 692) = 0.398, P > .$

05]主效应,也不存在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F(19,692) = 0.674, F(19,692) = 0.980, P > .05$]。

在青少年接受父母观念影响方面,存在极其显著的父亲职业主效应[$F(6,692) = 2.887, P < .01$],父亲为专业技术人员的青少年接受父母观念影响的程度显著高于父亲为个体经营者的青少年($M = 3.51, M = 3.25$)。不存在母亲职业[$F(6,692) = 1.500, P > .05$]和受教育程度[$F(4,692) = 0.595, P > .05$]主效应,也不存在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F(19,692) = 0.708, P > .05$]。

(三)青少年反哺态度与反哺行为之间的相关

对青少年反哺态度的统计显示,20.5%的青少年对文化反哺持消极态度(得分小于3),79.5%的青少年对文化反哺态度积极(得分大于等于3)。卡方检验显示,对待文化反哺态度积极的青少年极其显著地多于态度消极的青少年($\chi^2 = 251.352, P < .001$)。

以青少年的反哺态度为因变量,分别以性别、年级、父母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为自变量进行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的反哺态度存在显著的母亲文化程度主效应[$F(4,692) = 2.723, P < .05$],母亲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的青少年对待反哺的态度比母亲文化程度为大学、高中、中专或技校、初中以及小学的青少年更积极,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学的青少年对待反哺比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青少年态度更积极,其他两两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按照母亲受教育程度由高到低的顺序,青少年反哺态度得分依次为:4.063、3.668、3.529、3.453、3.510。不存在性别、年级、父母职业和父亲受教育程度主效应以及任何因素间的交互作用。

将青少年的反哺总均分与青少年的反哺态度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对待反哺的态度与青少年的反哺程度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r = 0.421, P < .001$),青少年对待反哺的态度越积极,青少年的反哺程度越高。

(四)青少年亲子关系的基本特点

对青少年与父母冲突发生频率的统计显示:17.6%的青少年报告近半年来与父母未发生过冲突,51.1%的青少年报告近半年以来与父母发生过1-5次冲突,25.5%的青少年发生过6-10次,5.8%的青少年发生过11次以上。与父母发生过冲突的青少年,32.8%感觉与父母冲突过程中“有些不平静”(得分为2分),17.6%感觉“气愤”(得分为3分),38.5%的青少年感觉介于这两者之间(得分为2.08-2.90),11.1%的感觉“较为气愤”和“很气愤”(得分为3.08-5)。

对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亲和度的统计表明,86.7%的青少年报告“经常”或者“几乎总是”感到与父母较为亲密,或者与父母一起做事情等(得分为3分以上),13.3%的青少年报告“几乎从不”、“偶尔”和“有时”(得分为1-3分)。

1. 青少年亲子冲突频次和冲突强度的性别、年级差异

分别以冲突频次和冲突强度为因变量,性别、年级为自变量,进行 2×5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的亲子冲突频次存在显著的年级主效应[$F(4,712) = 2.989, P < .05$],初二、初三青少年的亲子冲突频次显著高于高二、高三青少年($M_{初二} = 4.69, M_{初三} = 4.49, M_{高二} = 3.54, M_{高三} = 3.61$)。不存在性别主效应和性别、年级之间的交互作用。亲子冲突强度不存在年级、性别主效应和性别与年级之间的交互作用。

2. 青少年亲子亲和的性别、年级差异

方差分析显示,青少年与父母的亲子亲和存在显著的性别[$F(1,712) = 10.060, P < .01$]和年级[$F(4,712) = 3.378, P < .01$]主效应,女青少年与父母的亲和度显著高于男青少年($M_{女} = 3.78, M_{男} = 3.63$),高二和高三青少年与父母的亲和度显著高于初二、初三的青少年($M_{高二} = 3.80, M_{高三} = 3.82, M_{初二} = 3.63, M_{初三} = 3.57$),其他年级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五)双向社会化各变量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1. 亲子关系与双向社会化各变量之间的相关

将双向社会化各变量与亲子冲突和亲子亲和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各变量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如表 4 所示。亲子冲突与父母对青少年的影响呈极其显著负相关;亲子亲和与青少年文化反哺、青少年报告的父母影响及青少年对文化反哺的态度呈极其显著正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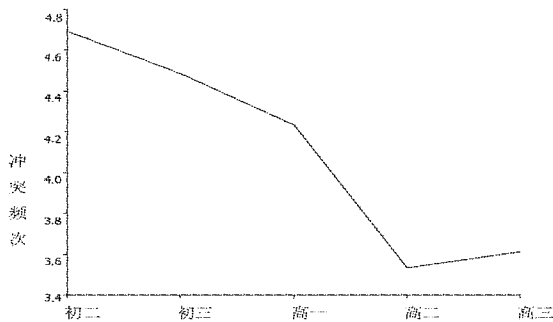


图 2 青少年亲子冲突频次的年级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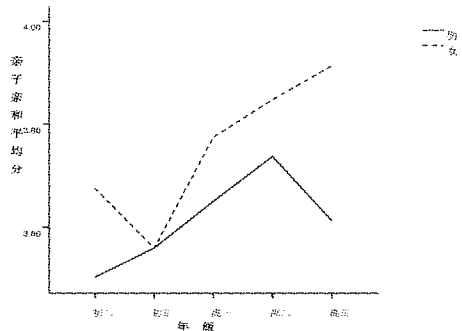


图 3 亲子亲和的年级和性别比较

表 4 亲子关系各变量与双向社会化各变量之间的相关

	父母影响	青少年文化反哺	青少年对待文化反哺的态度
冲突强度	-.136**	-.012	-.010
冲突频次	-.258**	.021	-.024
亲子亲和	.480**	.218**	.267**

注: * P < .05, ** P < .01。

2. 青少年亲子关系对双向社会化各分量表的回归

为探明青少年文化反哺、青少年对文化反哺的态度、父母对青少年的影响对其亲子关系的影响,将以上 3 个变量作为预测变量,亲子关系(亲子亲和、亲子冲突频次和亲子冲突强度)作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亲子关系各变量对双向社会化各变量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多元相关系数(R)	决定系数(R2)	增加解释量(ΔR2)	F 值	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
亲子亲和					
父母影响	.480	.230	.230	215.399***	.458
青少年文化反哺	.503	.253	.023	122.050***	.154
亲子冲突频次					
父母影响	.258	.067	.067	50.867***	-.258
亲子冲突强度					
父母影响	.136	.019	.019	11.1904**	-.136

注: ** P < .01, *** P < .001。

父母发挥影响的程度和青少年的文化反哺对亲子亲和具有极其显著的预测作用,父母发挥影响的程度越高、青少年文化反哺的程度越高,其与父母的亲和度也越高;父母发挥影响的程度对亲子冲突频次和冲突强度具有极其显著的预测作用,父母发挥影响的程度越高,亲子冲突的频次越低,亲子冲突的强度越小。

六、分析与讨论

(一)关于研究工具的编制

国内对“文化反哺”现象的研究已接近 20 年,但我们对该现象的了解似乎并没有随着研究时间的增长而加深,究其原因还在于实证研究量的缺少和质的欠缺。在反哺现象出现的初期,周晓虹先生以典型小组讨论法进行的研究在方法上是毋庸置疑的,其研究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然若想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某种现象,仅靠定性研究显然是不足的,我们可不可以用量化的方法对文化反哺进行研究?杨立、郜健以及陈正良等人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值得称道,但其所做的量的研究还是停留在浅层次的描述阶段,得出的结论也仅仅是频次的多少、百分比的分布等,难以对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作出科学考察。

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尝试围绕中学生的文化反哺和家长影响设计一种量表,同时对其年级、性别和父母背景变量等作出考察,以便于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分析。问卷的编制沿着两条线进行:一是查阅相关文献,归纳出青少年文化反哺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根据已有研究,青年的“文化反哺”或曰“反向社会化”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新器物的使用和新潮流的了解,消费休闲领域,价值观、人生观,但子代的反哺在文化的表层(日常行为或器物层面)最为明显(白显良,2003;周晓虹,2000)。不仅如此,子代对亲代的反哺也受到子代的文化水平、职业特征等的影响。本研究的被试为中学生,而中学生对父母的影响多限于流行的时尚和器物方面,因此根据文献归纳的结果,我们将流行时尚和器物的使用作为反哺的主要内容。

二是采用小组访问法分别对青少年和家长进行访谈,将访谈收集的资料进行归纳,确定文化反哺的主要内容除了文献中提到的流行时尚和器物外,还包括消费、休闲方式。相对于亲代影响而言,子代的反哺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问题,因此以往的研究大都关注的是“文化反哺”这一新现象,而没有对父母的影响进行考察和论证。本研究关注的中心依然是“文化反哺”,但我们也对父母的影响进行了考察,以便于进行二者间的比较。同时也可以探讨父母影响和亲子关系之间的相关。根据访谈的结果和研究的需要,父母影响的题目围绕行为层面和观念层面进行设计,由青少年报告接受父母的行为安排和认同父母的某些观念的程度。

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总问卷由 5 个分量表构成,它们分别是:消费休闲反哺分量表、技术反哺分量表、青少年反哺态度分量表、父母影响(行为)分量表和父母影响(观念)分量表。5 个分量表的信度都在可接受范围之内,5 个分量表之间呈中低度相关,5 个分量表与总量表呈中高度相关;各分量表内部条目间呈中低度相关,各条目与分量表间呈中高度相关。该问卷具有较高的效度。

(二)关于双向社会化模式

1. 双向社会化的基本特征

社会化的“双向模式”由贝尔 1968 年在《再释社会化研究的影响方向》一书中提出,其后许多研究者对反向社会化进行了阐释和论证(李秋洪,1991;陈正良,2005)。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反向社会化的存在,以科学事实证实了社会化的双向模式,并对家庭中这种双向影响的程度进行了分析。

研究显示在最能代表中学生反哺水平的两个方面——消费休闲和技术反哺——绝大部分青少年都对父母进行过反哺(消费休闲:99.2%;技术:97.1%),这说明文化反哺在中学生家庭中是普遍存在的。对消费休闲和技术反哺两个分量表均分的比较显示,青少年技术反哺的水平极其显著地高于消费休闲反哺,频次统计也发现经常对父母进行消费休闲反哺的青少年占 4.6%,而经常对父母进行技术反哺的青少年却占到了 26.7%,这说明相对于父辈,青少年在现代技术的运用方面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这和已有研究基本一致(杨立、郜健,2002;陈正良,2005)。

从整体上看,青少年的文化反哺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反哺总均分为 2.84),即在范围上看几乎每一位青少年都存在文化反哺行为,但在程度上看他们的反哺发生的频率还是较低的,多数是偶然的、自发的行为。青少年的文化反哺存在个体上的差异,大部分青少年只是偶尔对父母进行文化反哺,只有少数青少年能够经常性地反哺父母。

研究显示,家庭内的青少年反哺和父母影响呈低度正相关,这说明青少年反哺和父母影响之间

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家长不必担心子女的反向社会化会导致父母影响力的降低,越是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子女的反哺,反而会更有利于让孩子接受你的影响。而且我们的研究也证明,子代反向社会化的存在并没有瓦解亲代的影响作用,研究显示,父母对青少年的影响要高于青少年对父母的影响。这一结果足以令对“反哺现象”惶惶不安者欣慰,父母权威的存在使文化得到传承,社会传统得以传递,青少年反哺的存在使新的文化、新的观念不断补充进来,但又不会对已有传统造成太大冲击,社会得以前进,文化永葆活力。

但是,青少年毕竟尚未成熟,往往对各种外来文化、各种新生事物缺乏鉴别力,或是全盘接受,或是否定一切,缺乏应有的批判分析和尊重。因此,青少年的反哺中既有合理的部分,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消极的、甚至腐朽的内容。作为父母,在宽容对待子女反哺的同时,应该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较好的鉴别和判断能力、较强的信息过滤能力,引导子女正确认识各种新现象、新事物、新观念,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关于双向社会化的年级趋势和性别差异

由图1可以看出,青少年的反向社会化和正向社会化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反向社会化的两个维度呈一种不规则的年级趋势,而正向社会化的两个维度却呈现出比较明确的方向趋势。具体来说,青少年的消费休闲反哺和技术反哺并非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增加,而是在初三出现峰值,然后呈下降趋势,在高三又开始升高。这一方面和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征相吻合(林崇德,2001),另一方面也和青少年在学校所处的地位有关。初三和高三分别是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的最高年级,较高的年级地位更促使他们产生一种成人感,一种“我是老大”的自我意识,这种成人感和“老大意识”反映到家庭内的社会化中,就是对父母“指点”行为的增多。

父母影响(行为)随年级的升高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父母影响(观念)随年级的升高呈现出比较平稳的上升趋势。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简单的、行为指令式的教育逐渐对青少年失去作用,而向孩子说明事理、解释观念更能得到他们的认同。图1的结果同时也显示,社会化的双向模式是相对独立的,与父母影响相比,中学阶段青少年的反哺具有不确定性,没有成为一种持续而稳定的行为。尽管前述结果表明反向社会化与父母影响呈低度正相关,但是不能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化理解,在运用这一相关指导亲子关系时,还应把青少年的心理特点考虑进来。

关于双向社会化的性别差异,女生的消费休闲反哺水平比男生要高,男生比女生更容易接受父母的观念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女生比男生更关注家庭的内部事物,而这些内部事物突出地表现在消费休闲方面,因此女生在这个方面表现出更多的反哺倾向性。与女生相比男生的独立性更强,顺从度更低,更关注父母要求自己做什么事情的内部原因,更关注行为背后的认知指导,因此他们更愿意在观念层面接受父母指导。

3. 关于双向社会化的影响因素

社会化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在本研究中我们设计了父母亲的职业和文化程度进行考察。结果显示,母亲的文化程度对青少年的反哺行为和反哺态度具有重要影响,母亲文化程度越高,青少年的反哺程度越高;母亲文化程度越高,青少年对反哺的态度越积极。而父亲的文化程度和职业却不会对上述变量产生影响。这是由父母角色的不同而导致影响作用的差异,在家庭中,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格局和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母亲更多地参与子女的日常生活管理,与子女有更多的互动,因此母亲对某一事情的态度很容易影响到子女。母亲文化程度越高,对子女所表现出的反哺行为越宽容,越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接纳子女的反哺,这种正向强化促使子女表现出更多的反哺行为。

态度是主体对某特定对象进行认识、评价并作出价值判断所形成的心理倾向。既然是心理倾向,也就是心理的一种准备状态,它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行为方式(张红涛、王二平,2007)。统计显示,青少年对待反哺的态度与其反哺行为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青少年对待反哺态度越积极,其反哺行为也会越多。

(三)关于青少年的亲子关系

亲子冲突在青少年中带有普遍性,研究发现绝大部分被试坦言近半年来与父母发生过冲突,但大部分青少年与父母冲突的次数较少,冲突的强度不是很高,这说明青少年期并非像霍尔等早期心理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段急风暴雨般的时期,反映在亲子关系方面,它更像是一段亲子关系的转变期而不是破裂期。然而,尚有一部分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较为紧张,冲突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很高。11.1%的青少年报告与父母冲突强度很高,13.3%的青少年报告“几乎从不”或者“偶尔”与父母有亲密感与和谐感。因此,我国青少年期的亲子关系尚需改善。

研究显示,青少年与父母的亲子亲和和冲突频次均表现出显著的年级差异,高二和高三青少年与父母的亲和度显著高于初二、初三的青少年,初二、初三青少年的亲子冲突频次显著高于高二、高三青少年。这和初中、高中青少年个性发展的特点是吻合的。初中生自我意识高涨,经常沉浸在关于“我”的思考和感受中,很容易忽视掉他人的感受,自我意识的高涨导致反抗心理的产生,对一切外在力量予以排斥,越发感觉到父母不能理解他们的想法,由此造成与父母感情的疏远(林崇德,2001),因此与父母亲和度较低;高中生虽然也有独立性的要求,但是这种独立性要求是建立在与成人和睦相处基础上的,多数高中生基本上能与其父母或其他成人保持一种肯定的尊重的关系,因此,与父母亲和度高于初中阶段。

与男青少年相比,女青少年与父母有着更为亲密与和谐的关系,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王美萍、张文新,2007)。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青少年的影响,父母更期望男孩独立、自主,忽视与其亲密性的培养,父母在对待男孩女孩的态度上也有所区别,对待女孩更温柔一些、更宽容一些,而对待男孩则更严厉,父母的这种态度引发了男孩女孩不同的互动反应。另一方面,这可能与男女性别差异有关,男孩更为好斗,更主动、更喜欢支配别人、更富有竞争力,而女孩情感更细腻,表达能力强,更倾向于服从,因此,女孩更容易与父母亲近与交流,更容易形成和谐的亲子关系。

(四)青少年反哺、父母影响与亲子关系之间的关系

相关分析显示,亲子冲突与父母对青少年的影响呈极其显著负相关;亲子亲和与青少年文化反哺、青少年报告的父母影响及青少年反哺态度呈极其显著正相关。同时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表明,父母影响的水平和青少年的文化反哺对其亲子亲和具有极其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父母影响的水平对亲子冲突频次和冲突强度具有极其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说明青少年接受父母影响的水平越高,青少年与父母的亲和度越高,青少年的反哺行为越多,其与父母的亲和度也越高。这一结论看似矛盾,实则“事出同因”,无论父母发挥影响还是青少年进行反哺都增加了亲子之间的互动,互动是双方相互了解的基础,当这种互动为良性时,肯定会促进亲子亲和度的增加。本研究中青少年接受父母影响的程度越高,他们之间的互动越是良性的,其亲和度也越高。青少年反哺行为的增多不必然导致亲子亲和度的增加,但是因为本研究中的反哺仅限于消费休闲和技术,一般来说父母对上述内容的反哺多持接纳态度,所以当青少年上述两方面的反哺行为增多时,其与父母的亲和度也增加。因此,关键在于父母态度。当青少年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反哺行为时,如果父母持一种宽容和接纳的态度,那么这时候反哺只会增加亲子良性互动的机会,促使亲和度的增强。很遗憾,此次研究未能将父母的反哺态度一同考察,在今后的研究中需将父母态度这一变量考察进来。

回归结果还显示,在三次回归中,父母影响总是首先进入回归方程,且贡献率最高,这说明在中学生的亲子关系中,父母的角色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父母能以恰当的方式给予孩子积极的、正确的影响,孩子也乐于接受这种影响的话,那么其亲子关系也是高质量的。

七、教育建议

(一)父母应该坦然接受并理性对待青少年的文化反哺现象

青少年的文化反哺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并且在本次实证研究中得到确认。对此,家长应该坦然接受,理性对待。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人类文化传递模式的确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青少年获得文化知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途径已经摆脱了对父母的依赖,父母的文化权威已经不再是不容置疑的,封建式的家长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父母不应该对孩子颐指气使,指手画脚,摆家长威风,“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都多”已经成为老黄历。应该承认,在网络时代,青少年在现代观念与社会适应方面,确实优越于父母一代,在网络知识、数字产品、消费休闲等方面对父母的反哺也是最为明显的。面对某些方面优于自己的子女及他们对自己的“指手画脚”,家长需要的是心平气和、心悦诚服甚至在某些方面甘拜下风。一方面要看到反哺促进了自身知识的更新、帮助自己更好地融入日新月异的现实社会,另一方面更要看到反哺给子女带来的自豪感和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文化反哺并没有颠覆父母的形象和地位,相反对于青少年的社会化和家长的再社会化都有着重要作用。

(二)发挥父母主导作用,对孩子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指导

双向社会化模式虽然存在,但正向社会化仍是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路径。家长在青少年的成长发展过程中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解决人生价值、伦理道德、社会和谐等核心价值观方面,父母担负着重要社会责任。所以,父母不必担心孩子在家长面前放纵无羁,把家长的教诲当作耳旁风,更不能因为文化反哺就削弱或放弃自己的教育责任。青少年思维活跃,好奇心强,比较容易接受新鲜的事物,但同时也易受到外部的不良影响。网络上各种良莠不齐的信息污染着孩子们的视听,来自同伴群体的不良行为也在影响着孩子的健康成长。因此,父母必须发挥教育监管者的作用,对孩子的网络、交友行为进行适时地监督和指导,以适当地言行和观念规范孩子的社会性行为,帮助孩子辨别是非正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与现状社会化进程同步产生的不良后果。

(三)提高父母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改善家庭教育方式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并且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父母必须要不断学习和进取,努力提高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在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下,更要保持理性的观点和立场。这对于青少年合理价值观的形成和同一性的获得都具有重要意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孩子正是通过观察和模仿习得社会性行为。家长的潜移默化和言传身教都有声或无形地塑造着孩子的行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也关乎孩子的社交能力、学业成绩乃至人格发展。因此,父母双方要共同担负起教育子女的重任,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提高教育子女的能力。一方面,树立权威,一方面以民主、平等地态度对子女实施教育。

(四)了解孩子的心理特点,科学地进行家庭教育

儿童从出生到成人,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生理、心理特点,而且,每一个儿童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只有了解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了解孩子的个性特点,才能有的放矢地教育好孩子。中学生特别是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期,身体的骤然增长、第二性征的显现及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他们更加注意自身的形象,关注同伴对自己的接纳和评价,由于心理发展水平落后于生理的发展,对自我的过分关注引发了许多心理困惑。他们崇尚独立和自由,总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不愿顺从父母、老师及其他成人的意见,躁动不安、叛逆和心理闭锁。因此,青春期孩子的父母需要调节心态,正视孩子对自尊、独立、民主的要求,注意生活中的细节,耐心与孩子交流,不讲大道理,尽量避免发脾气。到了高中以后,由于思维能力的发展,青少年的心智趋于成熟,亲子关系明显好转。这时父母需要从关注孩子的行为习惯转向其思想观念的教育。同样,男孩和女孩的心理特点不同,对男生的教育更要晓之以理,以理服人;对女生的教育更要动之以情,以情感人。

总之,只有了解孩子的心理特点,从本体——孩子出发,家庭教育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否则就会事倍功半甚至是背道而驰。

八、结论

第一,反向社会化在青少年家庭中普遍存在,青少年的反向社会化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就反哺的内容来讲,青少年的消费休闲反哺与技术反哺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青少年的技术反哺极其显著地高于消费休闲反哺。

第二,父母影响和青少年反向社会化之间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而且父母影响的整体水平高于青少年反向社会化;进一步研究显示,父母对青少年的观念影响与行为影响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父母对青少年的观念影响极其显著地高于对青少年的行为影响。

第三,青少年的反向社会化和正向社会化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反向社会化呈现不规则的年级趋势,并非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增加,而是在初三出现峰值,然后呈下降趋势,在高三又开始升高;而正向社会化的两个维度却呈现比较平稳的趋势,父母(行为)影响呈下降趋势,父母(观念)影响平稳中略有上升;

第四,青少年的消费休闲反哺存在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比男生表现出更多的消费休闲反哺行为;父母(观念)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接受父母观念影响的程度显著高于女生。

第五,母亲的文化程度对青少年的反哺行为和反哺态度具有重要影响,母亲文化程度越高,青少年的反哺程度越高;母亲文化程度越高,青少年对反哺的态度越积极;

第六,青少年的亲子亲和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年级差异,女青少年与父母的亲和度显著高于男青少年,高二和高三青少年与父母的亲和度显著高于初二、初三的青少年;

第七,父母影响、青少年的反哺态度和青少年的反哺程度对亲子亲和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父母影响对亲子冲突频次和冲突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青少年的反哺程度对亲子冲突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参考文献:

- 白显良,2003,《青年社会化中的“文化反哺”现象探析》,《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第1期。
- 陈正良,2005,《“文化反哺”现象及社会意义探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1期。
- 林崇德,2001,《发展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 李秋洪,1991,《青年社会化研究的新课题》,《青年探索》第6期。
- 玛格丽特·米德,1987,《文化与承诺》,河北人民出版社。
- 王美萍、张文新,2007,《青少年期亲子冲突与亲子亲和的发展特征》,《心理科学》第5期。
- 杨立、郜键,2002,《网络传播时代青少年“文化反哺”现象调查与研究》,《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张红涛、王二平,2007,《态度与行为关系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心理科学进展》第1期。
- 周晓虹,1988,《试论当代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青年界》(创刊号)。
- ,2000,《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社会学研究》第2期。
- Fuligni, A. J., 1999, “Attitudes toward family obligation among American adolescents with Asian, Latin American, and European backgrounds”. *Child Development*, 70.
- Fuligni, A. J., Zhang Wenxin, 2004, “Attitudes toward family obliga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contemporary urban and rural China”. *Child Development*, 1.
- Holmbeck, G., 1996, “A model of family relational transform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adolescence: Parent – adolescent conflict and adaptation.” In Graber J, Brooks – Gunn A Petersen (Eds.). *Transitions through adolescence: Interpersonal domains and context*. Mahwah, NJ: Erlbaum.
- Reich, C. A., 1970, “The greening of America”. New York: Bantam Books Inc.
- Steinberg, L., 1981, “Transformations in family relations at puber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7.

作者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山东省青少年研究所
责任编辑:赵联飞